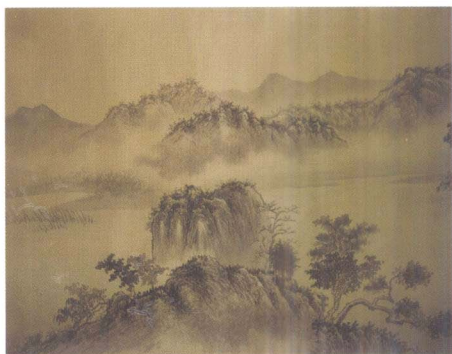


文道之境——考述桐城

曾光光 著

Tongchengpai Yu Wanqing Wenhua

桐城派与晚清文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桐城派与晚清文化

TONGCHENGPAI YU WANQING WENHUA

曾光光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桐城派与晚清文化/曾光光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12

ISBN 978-7-5461-2284-7

I. ①桐… II. ①曾… III. ①桐城派-文学研究
IV.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6674 号

桐城派与晚清文化

曾光光 著

出版人:左克诚

责任编辑:王海宏

责任印制:李 磊

装帧设计:钱志刚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0551-3533762 3533768

印 制: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0551-2835393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25

字数:300 千字

版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978-7-5461-2284-7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本书以晚清桐城派为研究主体。在展开具体研究时,我选取了社会思潮、教育、学术与文学四个角度,力求对晚清桐城派展开较为全面的研究。从具体文化的视角看,社会思潮、教育、学术与文学等都属于文化的具体领域,正是从这一角度考虑,我将书名定为《桐城派与晚清文化》。在涉及诸多具体问题的探讨时,我也力求从文化的视角予以分析。

为何要将写作时限限定到晚清一段,主要是因为晚清是中西文化冲突、交汇最为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桐城派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派也必将突破自身的局限,或多或少地将学派的发展与时代危机、文化热点问题联系起来。桐城派在晚清一段一度出现“桐城中兴”的发展高峰,与其能“因时而变”不无关系。

桐城派在一般人的眼中是一个保守的派别。客观而论,这种评价是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桐城派末流的评价,而不是对作为整体的桐城派的客观评价。桐城派前后延续时间达二百余年,不能

以其末流来替代整体,对其末流的评价自然也就不能替代对其整体的评价。

这种评价也是站在现当代的时间角度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评价。以今日之新而将过去概称为旧,这种时代的优越感很容易抹杀承继传统文化的努力。时代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今日之新,起于昨日之旧。无昨日之旧,何来今日之新?若将昨日之旧一概斥为保守,在这样一种惯性思维之下,今日之所谓新转眼也会成为明日之旧。

若以新、旧来区分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不仅会将作为整体的民族文化判然划分为新、旧两个部分而导致整体文化的割裂、破碎,还易导致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这种对新的不断追求,在获得跟上时代步伐的美誉与满足的同时,我们也许会逐渐失去基于悠久传统文化的文化稳定感与平和的文化心态。民族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累加而非不断否定的过程,否定与怀疑过去不一定意味着新生,一味激进有时也潜藏着浮躁迷惘甚至丧失自我的风险。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素有经世精神,在不同的时代,经世致用思想或隐或显,始终是一种贯穿中国历代的人文精神。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困境唤醒了包含桐城派人士在内的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的经世意识,他们纷纷走出书斋,把眼光投向政治、经济、现实并不断提出相应的救世方案。正是基于此,全书才选择从社会思潮、教育、学术、文学等方面来综合考察晚清桐城派的发展,选择这样的视角,也就不再将晚清桐城派视为单纯的文派,而考察其文学思想仅仅是全书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某种程度上看,传统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与参与是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到重大危机时的一种自我调整。当统治

者面对危机束手无策或是刚愎自用的时候,知识分子的主动参与也许会为社会危机的纾解提供一条新路。当然,对于知识分子的参与,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都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尤其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还有可能危及现存的统治。对于握有统治权的阶层来说,给别的阶层提供发言的机会,也就意味着要丧失自己的部分发言权,甚至还有可能要从自己的权力蛋糕中切除一块既得利益。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则多是从维护、巩固现存统治的角度提出“补天”方案,晚清桐城派诸人多为体制内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政治、现实的关注也是在体制范围内的关注,这既是晚清桐城派得以“中兴”的一个原因,也是晚清桐城派被视为保守派的一个重要因素。革命在近代中国是社会变革的一个中心词甚至是是非正误的判断标准,在这一标准之下,晚清桐城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包含辛亥革命在内的近代革命的发生有一个很长的铺垫过程。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就是辛亥革命爆发所必经的历史环节,没有洋务运动的失败,国人就不会将眼光从物质文化转移到制度文化层面上;没有戊戌维新的失败,国人也就不会将眼光从政治变革转移到政治革命上。同样,没有体制内的改革派抑或保守派的种种尝试与努力的失败,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改革派抑或革命派也就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巨大的波澜。从这个角度看,近代革命爆发前所经历的铺垫过程中所包含的所有历史环节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价值,近代革命的成功不仅有革命者、维新者的努力,还应包含晚清桐城派在内的部分保守者的努力。

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速度远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其速度之快连思想激进的改革派也跟不上步伐。近代中国社会为何如此求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亡国

亡种危机,这种危机的紧迫性使近代中国人已经没有耐心去等待一种社会方案有条不紊地展开。近代中国需要的不是“合理”的方案,需要的是能迅速实现自强与救亡图存目标的方案。曾经的改革派如洋务派、维新派所以转瞬就为近代国人所抛弃,甚而被列入保守派、顽固派、保皇党的行列,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救亡图存的现实问题,一个原因则是新的救亡图存方案的涌现。

在求新求变的时代,作为文化保守主义代表的桐城派也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开始了求新求变的进程,但在如此求新的时代,晚清桐城派的求新求变之举也就难以引人注目了。在快步如飞的时代行列中,对前进的评价标准不仅包含方向,还包含速度。在求新道路上速度稍有迟缓者也难逃淘汰的命运,更遑论那些延宕、迟疑者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保守派的处境其实比改革派要尴尬得多。改革派只管一路高歌猛进,赢得的都是欢呼,而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派别的晚清桐城派则退也不是,进也不是。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大趋势其实早已决定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命运:往后退,已经没有路;原地踏步不动也没有多少空间;往前走,又能走多远呢?保守与激进之间可以兼容的地方其实不多,一个文化保守派如果真正踏上文化激进的路径,它也就开始了自我毁灭的过程。不前进亡,前进也亡,这就是桐城派在晚清的尴尬境地。

在近代文化的转型过程中,晚清桐城派也试图往前走,其各期的代表人物在传统文化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在不影响桐城派存在的前提下,不断调整、变革古文理论中不合时宜的因素。晚清桐城派不仅在一些具体文化领域跟上了时代步伐,某些时候还引领时代风气之先,但他们的求新步伐走得异常谨慎,求新求变的

步伐虽能为学派的新生带来活力,但也能为学派的覆亡留下隐患。

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成功,不仅宣告了“旧政体”的消亡,也使作为“国朝”的“古文正宗”的桐城派变得无所依托了,“国朝”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国朝古文正宗”,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这个道理。

辛亥革命其实已经决定了作为“国朝”一个组成部分的桐城派的命运,但“旧政体”可以一夜消亡,“旧学界”的消亡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作为“旧学界”代表的桐城派面临真正的危险则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了。在新文化运动中,古文是新文化健将批判的一个旧文化靶子。古文是旧文化的典型符号,作为“百年古文正宗”的桐城派自然具有了旧学界、旧文化的典型身份。桐城派尽管迈出过求新求变的步伐,但它作为旧文学的“正宗”,作为旧文化体系中的代表,自然要成为新文化运动清除与革新的对象。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桐城派曾经一度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也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了,怎么“紧跟”也改变不了自己保守、顽固的文化形象,还不如不“紧跟”了。在新文化主宰一切的时代,一个学派抑或个人一旦打下了旧文化、旧学界的文化烙印,其实已经无路可走了,历史潮流浩浩汤汤,亡也得亡,不亡也得亡。在这场文化洪流面前,桐城派末流选择了“回归”,重新退回到桐城派“义法”的堡垒中。只不过这个堡垒已经不能再保护他们,曾经坚不可摧的堡垒早已千疮百孔,再躲进这个堡垒就只能被嘲笑为“妖孽”了。近代中国文化求新求变的总体特征其实没有为文化保守派别提供多少空间,如果有的话,也是毁灭的空间。

本书的重点就在于发掘晚清桐城派在求新时代中的求新求

变之举。桐城派最后虽然被时代淘汰了,但不可否认它曾有的努力。历史的发展是由“合力”推动的,既然是“合力”,就不仅包括作为主力的推动力,还应包括种种作为分力的推动力,即便微弱,它也是“合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里还有必要将本书的主要观点作一简单的概述。

一是晚清桐城派的活动与晚清社会思潮的流变相始终。在晚清经世思潮、洋务思潮、早期维新思潮、维新变法思潮中均可看见桐城派人物活跃的身影。在晚清学习西方、求新求变的进步浪潮中,桐城派也有求新求变的一面,但桐城派固有保守的一面,使它在时代思潮的迅疾发展中逐渐落伍,最终在“五四”新文化思潮中成为被扫除的对象。

二是桐城派的部分人士也曾试图汇入到中国教育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桐城派的产生、发展、兴盛相当程度上依托于传统的教育制度,但晚清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变革却使桐城派得以传承的基础渐次削弱,使桐城派的文化影响逐渐缩小。在传统教育制度中游刃有余的桐城派,在近代教育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显得步履维艰。桐城派中的部分文士试图汇入到近代教育制度转型的进程中,但其文言古文、学术立场、知识构成以及与科举制度的关系,注定最终为时代所淘汰。

三是晚清桐城派试图借理学中兴担负起朝廷中兴与社会道德重建的重担。桐城派从一开始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持道统论的桐城派紧紧依附于程朱理学,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在咸同年间的中兴,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理学的复兴。晚清桐城派不仅在经世致用与道德重建上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还倡导学术兼收,使理学也使自身获得了活力。但维新变法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的相继涌

现、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西学的大量传播,使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了传统经学之争,经学在晚清社会逐渐走到尽头。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理学的桐城派最终无所凭借而逐渐销声匿迹。

四是晚清桐城派诸人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确实为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桐城派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派别显扬于有清一代,晚清桐城派虽然继承了“文以载道”的古文理论,但对“文”、“道”之间的关系多有反思。他们中的部分人士甘以文士自居的坦然态度,将“义理”与“文章”相剥离的思想倾向,使传统文学向着独立发展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晚清桐城派虽然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变革与翻译西方文学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其对桐城派古文语言与宗法伦理道德的固守,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相背离,最终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障碍。

晚清桐城派是一个文化矛盾体,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因革,在它的身上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对晚清桐城派进行研究,也许可以更具体、生动地展现桐城派在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演变轨迹。通过对这一轨迹的仔细梳理,笔者力求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在近代文化的转型过程中,桐城派的代表人物虽谨守桐城派的家法,但并不顽固,他们在传统文化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在不影响桐城派存在的前提下,能够“因时而变”,能够不断调整、变革古文理论中不合时宜的因素。晚清桐城派在面临社会大变革时所作的自我调整,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生动体现。

桐城派的“因时而变”,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中华文化“因时而变”的特征。正是这种文化特征使中华文化每逢重

大的文化挑战与危机时总能转危为安、薪火不绝,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文化挑战与以往相比有了本质的不同,面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挑战,近代中国人不仅在战场上输了,在心理上输了。文化自卑感的产生使代代相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始面临真正的危机,这次危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桐城派的“因时而变”最终以“谬种”、“妖孽”收场,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命运。

坚守古文的桐城派最终把自己输掉了。输掉的原因也很简单:“因时而变”的路最后走不下去了,再“变”下去就不是桐城派了。对近代中国的传统学派而言,“变”与“不变”,前景似乎都不光明。桐城派只不过是一个传统学派,在中西文化的这场对抗中,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的命运将会如何呢?这个结果的产生还在过程中,这个过程是近代中国人已经参与过还未得出答案的过程,也是当代中国人正在参与、正在等待答案的过程。

序言的笔墨主要放到了对全书内容的介绍上,主要是希望在短小的序言中尽可能地将全书的观点、内容展现出来,以为读者判断、取舍本书提供方便。

目 录

自 序

绪 论	001
第一章 桐城派渊源	014
第一节 古文概念与流变	015
第二节 桐城派兴起的缘由	020
一、文学发展、学术流变与桐城派的兴起	020
二、清代科举制度与桐城派古文的兴盛	024
三、桐城派的兴起与区域文化背景	029
第三节 从方苞、刘大櫟到姚鼐	033
一、方苞的“义法”说	034
二、刘大櫟的贡献	050
三、姚鼐与桐城派立派	055
第二章 晚清桐城派的嬗变与社会思潮的演进	061
第一节 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冲击	062
一、经世传统	063
二、顺时应变的姚门弟子	065
三、低谷与转机	076

第二节 “桐城中兴”与洋务思潮	080
一、洋务重臣加盟桐城派	081
二、“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	087
三、政治集团与文学派别的组合体	093
第三节 桐城派与维新变法思潮	097
一、早期维新思潮中的桐城派代表	097
二、吴汝纶与维新变法思潮	100
三、故步自封的桐城派末流	108
 第三章 桐城派与晚清教育的近代化	 114
第一节 传统教育与晚清桐城派的传承	115
一、家学传授与桐城派的传承	116
二、师事、私淑与桐城派的传承	120
第二节 书院与晚清桐城派的传承	132
一、桐城派与书院的历史渊源	133
二、晚清桐城派与书院	139
第三节 晚清桐城派与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156
一、吴汝纶、王先谦与书院制度的近代化	156
二、王先谦与新式学堂的浪潮	162
 第四章 桐城派与晚清学术思想的变迁	 171
第一节 桐城派与晚清理学	172
一、学术传统——理学的忠实追随者	172
二、桐城派与晚清理学变迁	176

第二节 晚清桐城派与学术兼收	200
一、桐城派与汉学家的恩怨	201
二、晚清桐城派的学术兼收思想	207
第五章 桐城派与晚清文学的变革	216
第一节 晚清桐城派对文学的复杂态度	216
一、从唐宋古文家的双重身份说起	217
二、徘徊于“文”、“道”之间	220
三、“坦然以文字自期”	230
第二节 桐城派在晚清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236
一、“桐城固白话文学之先驱矣”	236
二、游离于晚清文学发展主潮之外的桐城派	249
结 语	256
征引文献与主要参考书目	263
后 记	277

绪 论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延绵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桐城派古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宗法伦理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桐城派一般以康熙年间的方苞为初祖,^①1930年,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去世,桐城派至此才画上句号。桐城派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桐城派以活动于康熙至嘉庆年间的方苞、刘大櫟、姚鼐为主要代表。

这三人均为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得名。方苞关于古文文论基本纲领的“义法”说;刘大櫟关于“神气”、“音节”、“字句”的文章要素理论;姚鼐关于“义理、考据、辞章”的古文创作论,奠定

^① 康熙三十年(1691),24岁的方苞至京师,并于是年立下了“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方苞提出“义法”说大致在康熙末年;雍正十一年(1733),66岁的方苞编成示范“义法”说的古文读本《古文约选》,方苞关于古文文章纲领的理论至此定型,桐城派也以此为起点,开始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方苞的“义法”说,成为“桐城瑰宝,代代传授,影响深远”。见许福吉:《义法与经世——方苞及其文学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体系。中期桐城派主要活动于晚清时期,主要代表有梅曾亮、方东树、曾国藩、黎庶昌、吴汝纶等人。这一时期的桐城派在时代变化面前,一方面承继桐城派先辈衣钵,一方面在古文理论与创作上都有所变革,一定程度跟上了时代变革的步伐。后期桐城派,即桐城派末流,主要活动于辛亥革命以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固守桐城派古文与程朱义理,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谬种”、“妖孽”。^①

在研究时限上,本书大致定位在晚清,即桐城派发展中期这一阶段。在对晚清的时限界定上,本书沿用目前史学界通用的历史划分法,将晚清定位在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1年清朝灭亡这一时段。当然,书中对晚清前、后时期的桐城派也有所论述,以保持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将时限界定在晚清,主要原因在于晚清桐城派具有文化研究上的独特意义。在桐城派发展的三阶段中,前期桐城派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主要致力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建设。后期桐城派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已如强弩之末,地位与影响都有限。晚清一段的桐城派则处于社会变化、文化转型的大变革时期,作为文学派别的桐城派前所未有地被卷入到时代变化、文化转型的浪潮中,知识分子素有的经世致用精神使晚清桐城派在一定程度上汇入到时代浪潮中。与前期桐城派的平和渊穆、后期桐城派的顽固保守相比,晚清桐城派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开放、求新的文化特征。

综观晚清桐城派,他们虽谨守着桐城派的家法,但并不顽固,许多人关注西学,主张变革,在一些具体文化领域还引领时代风

^① 钱玄同:《文学革命之反响》,《钱玄同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气之先,为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本书从狭义文化的视角研究晚清桐城派。作为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是与政治和经济相对应的文化。^①狭义文化主要包括文学、教育、学术思想、社会思潮、艺术、社会习俗等具体的文化领域。本文主要选取社会思潮、教育、学术、文学等与晚清桐城派紧密联系的四个领域,具体研究晚清桐城派的演变与社会思潮递嬗之间的关系;研究桐城派在晚清教育、学术、文学等领域的活动、思想、贡献与局限;研究晚清桐城派在中国教育制度近代化、文学近代化、学术思想近代化进程中的正、负作用及影响。从狭义文化的视角将晚清桐城派与各个具体的文化领域结合起来研究,不仅可以从文学史、政治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等多学科的角度对晚清桐城派进行交叉研究,也可更具体、全面地展现桐城派在各个具体文化领域的衍变轨迹,更有益于对桐城派由盛及衰原因的理解,同时避免了单纯从文学角度研究桐城派的局限性。

在展开具体的研究前,还有必要对相关的学术史稍作梳理。

桐城派自清初产生以后就毁誉参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其末流更被斥为“谬种”。桐城派末流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它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冷落。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1920年至1980年间,桐城派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直到1980年以后,对桐城派的研究成果才日益丰富,研究视角也日益多样化。

一、1980年以前的研究状况

早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

① 参见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前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页。